

英 国

鲁绍臣

在 2008 年以来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似乎快要走出困境之际，却迎来了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 170 周年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爆发 100 周年的纪念之机。可以说，之前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已经较少从经济的危机、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崩溃、剩余价值的剥削等视角来纪念马克思的《资本论》了，而是以更加学术、系统、体系、科学，特别是人的存在方式的视角，对《资本论》加以研究和讨论，他们似乎要么只在纯学术的层面思考资本主义这一似乎具有铁的自然历史规律的社会形式及其超越的可能性，要么以非马克思主义的左翼运动的方式来进行着对资本主义的抵抗。

但是，随着《资本论》和十月革命纪念活动的展开，2017 年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应该说仍然在政治和现实影响力上显得十分活跃：英国工人党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节达到了 2500 人的空前规模；《历史唯物主义》杂志举办了多场纪念活动和学术年会，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话题进行了持续和深入的讨论；一大批纪念《资本论》发表 150 周年的论著和文章也在 2017 年得以发表与出版，比如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的完全版得以翻译到英语世界，哈维的《〈资本论〉与经济理性的疯狂》也上市出版。而《今日阅读〈资本论〉》则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今日的政治斗争为主线展开，不一而足，甚至可以用如雨后春笋般、令人眼花缭乱等词来形容这种活跃性。

为了突出主线、捕捉和彰显英国马克思主义学界 2017 年的问题意识与现实洞察力，以便为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真实的思想资源，我在接下来的报告中并没有面面俱到，而是以问题为导向，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来加以呈现。内容主要围绕以下五个方面的主题来展开。

一、会议与活动概览

《资本论》第 1 卷第一版发表 150 周年之际，2017 年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会议，大多与纪念《资本论》出版 150 周年有关。巧合的是，2017 年同样亦是苏联十月革命爆发 100 周年。因此，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必然是个重大的主题。英国《历史唯物主义》杂志的组织者认为，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得不重新思考葛兰西命题，即社会主义政治革命与《资本论》的关系，因此，在纪念十月革命发生 100 周年和《资本论》发表 150 周年之际，《历史唯物主义》2017 年 11 月 9—12 日年会的主题确定为“《资本论》与革命的再思考”。这样的主题，与会议组织者对《历史唯物主义》杂志年会的定调有关，在他们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年会很难说是标准的学术会议，其更是一个讨论与争辩，并进而发起集体规划的空间。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的年会是动真格的，不欢迎任何“客串”的现象。

就会议的主题而言，众所周知，葛兰西提出了“革命反对《资本论》”的主张。而会议组织者则反过来问，难道今天革命的偃旗息鼓是因为研究和学习《资本论》吗？即是不是可以说《资本论》反对革命？会议组织者和有诸多与会学者指出，事实上，葛兰西之所以将十月革命称之为“反《资本论》的革命”，主要是为了反对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作机械化诠释，而并非《资本论》本身是与革命政治实践相冲突的。对葛兰西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预言了可预言的，但并没有预言特定的断裂，以及人类社会所应该采取的形式。会议主题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性别与政治经济：往前看，往后看”、“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潮流”、“种族与资本”三个主题。

具体来说，虽然与会学者并没有全部都只讨论《资本论》，但《资本论》毫无疑问仍然是这届年会的主要讨论对象，贝洛菲奥里（Riccardo Bellofiore）在提交的论文中指出，虽然我们可以从多个侧面展开对《资本论》价值理论的分析，并提出多重的诠释路径，但在他看来，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

根基的价值理论，并不只是一个理论，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不旨在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错误，更在于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对于马克思而言，价值这一概念只有在货币体系的分析中才能获得有效性。在作者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为重要的贡献，是在对货币商品生产经济的分析中，探究了劳动的剥削机制，以及这一机制走向危机的倾向性。在作者看来，马克思完成了从价值的劳动理论（labour theory of value）向劳动的价值理论（value theory of labour）的转换。

像坎农（Bob James Cannon）等人则认为，有必要用规范性的政治理论来夯实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建构部分。即有必要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向规范性批判的转变，完成对马克思《资本论》价值理论的再辩护。马乌（Søren Mau）则在“资本的先验权力：论价值和阶级”的发言中，认为先验权力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大纲，另一次是在对大纲的笔记本里，作者认为这一概念对于理解资本权力的特殊形式具有重要的价值，即非人身的经济统治模型。其他与会学者还讨论了《资本论》总体性概念的政治意蕴；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商品化；当代艺术中的政治审美等数百个主题。

《历史唯物主义》杂志悉尼分会场的第六次年会 2017 年 12 月 7—8 日在悉尼大学举办，主题是“《资本论》与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摩尔（Jason W. Moore）做了主题发言。与悉尼借助《历史唯物主义》杂志的年会来纪念《资本论》不同，作为北美马克思主义左翼思想的研究重镇，加拿大约克大学也在 2017 年 5 月 24—26 日举办了马克思《资本论》出版 150 周年的纪念活动，会议主要围绕《资本论》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资本论》的政治学理论；超越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等主题展开，这次会议英语世界比较有影响力的左翼学者基本都到了，也发表了很多新颖的思考与讨论。他们的结论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比他在世时更有影响力，更具适用性和解释力。

具体来说，他们分别从社会学、政治理论、经济理论和哲学的视角对更小的主题，比如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批判、可替代的经济与社会模式、《资本论》的未完成性等视角展开讨论，为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转变形式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比较值得介绍的是在《资本论》的政治理论一节，约克大学的布凯里（Mauro Buccheri）介绍了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时期马克思整个人道主义思想的发展史；同样来自约克大学的科米奈尔

(George Comninel) 则从商品拜物教的视角介绍了《资本论》中的政治理论；来自英国的卡弗 (Terrell Carver) 则从述行理论、效仿和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介绍了重新阅读《资本论》的必要性。班奈尔吉 (Himani Bannerji)、安德森 (Kevin Anderson) 等人则从超越劳动与资本的单一视角出发，讨论了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对妇女、殖民与种族主义的依赖。波斯顿 (Moishe Postone) 则以“当代的危机与价值的时代错位”为题发表了看法；巴利巴尔 (Etienne Balibar) 则对比了马克思所在时代的资本主义与今日资本主义的不同；奥尔曼 (Bertell Ollman) 则讨论了基于未完成性的《资本论》第 1 卷的新理解，另外，作者认为被很多新马克思主义者视为理论珍宝的手稿，反过来在“核心论点上是有缺陷的”；杰索普 (Bob Jessop) 则讨论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政治哲学思考。

另一个非常学术的会议是 2017 年 6 月 24 日在伦敦大学学院由英国马克思与哲学学会举办的第 14 次年会，这次年会的主题是“马克思与劳动概念”，会议发言的主题主要有作为劳动批判的批判理论；学术工作的特征；革命的老师如何教学？马克思女性主义视角中的劳动常备军；马克思与劳动的双重本性：资本主义批判的中心轴；劳动，一个合理的抽象？库尔兹对资本实体和马克思先验劳动的解答；劳动和马克思方法的立场等。除此之外，他们还在 2017 年 2 月 25 日举办了题为“资本批判与劳动批判”的工作坊。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值得介绍的活动就是 2017 年 7 月上旬由英国工人党组织的一年一度的马克思主义节。虽然学术性没有《历史唯物主义》杂志年会和“马克思与哲学学会年会”的学术性强，但其规模很大，达到 2500 余人参加，因此值得一提。其 2017 年的主题是“何以能够为社会主义而战”。在与会者看来，今日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如何才能真正为社会主义而战，有的与会者认为罢工运动使得新自由主义的盔甲上漏了一个洞，这表明罢工对于建立一个全新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也有与会者提出，如果没有组织性的政治运动，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真实未来。

二、阅读《资本论》文本：怎么读，如何纪念？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 1 卷第一版出版 150 周年之际，英国学界也有诸多的论著介绍了解读《资本论》的最新思潮，以及阅读《资本论》的方法。

当然，在之前 100 周年之际，也曾经有个新马克思主义阅读学派兴起，在英国也以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存在多年，但对其进行系统性的介绍，并且明确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结合起来的，今年还是第一次。皮茨（Frederick Harry Pitts）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解读马克思的新方法》^① 是主要的代表论著。他在书中批判性地介绍和比较了当前西方学术界解读马克思《资本论》的两种主要思想流派：德国新马克思主义阅读和意大利工人自治主义。这两大思想流派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解读均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差异，特别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核心范畴的理解，可以说都是极其新颖或者根本不同的。

该书主要通过与他们中的重要代表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博内费尔德（Werner Bonefeld）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等人进行对话和对照的方式展开，进一步将当代学界对《资本论》的新解读与新思考呈现给读者。正如以前的报告已经提及的那样，新马克思阅读学派在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重新审视了《资本论》并激活了当代学界对《资本论》的阅读兴趣。在作者看来，这一学派首先面对或者应对的挑战，是西方学派关于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无法衡量的问题。即所谓当今资本主义的劳动已经超越了可用时间来衡量的时代，因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已然过时等对马克思的指责。另外，他们还要应对技术和科学的变化，即“一般智力”的兴起，也使得依据时间作为价值衡量标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因此必须为马克思展开关于智力、非物质、劳动对象的再诠释。

因此，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机械化的阅读路径，特别是所谓剩余价值率下降的规律。作者试图通过新马克思主义阅读的方法，指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对于劳动、价值思考的独特性及其核心方法。这个方法最为核心的地方不在于对内容的迷恋，而在于对形式的关注，从而其主要已经不是一种经济学的理论，而是将社会与政治批判寓于经济学的理论，或者说是“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新马克思主义阅读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传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接受了阿多诺等人对“票面思维”（ticket thinking）的批判。即不只

^① Frederick Harry Pitts, *Critiquing Capitalism Today: New Ways to Read Marx*,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是在集权主义国家中，在以自由和平等标榜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仍然只能把资本主义的中介的价值和商品形式理解为难以超越的藩篱，并且任何异议或批判都会被贴上“非理性的标签”。

因此，从社会批判的视角来看，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并不能将既定社会理解为一种暂时的、特定的社会形式，也不能理解这一作为存在前提的社会形式从何而来。而上述思想主要都来源于阿多诺开创性的政治经济学笔记，这也与传统学界的一般认知，即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哲学与美学批判的说法大不相同，为阿多诺没有展开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说法提供了驳斥的理由。

根据前面的介绍，我们发现，不管是新马克思主义阅读学派，还是意大利的工人自治主义学派，都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将具体劳动与价值直接勾连起来的做法。如果说传统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强调具体生活活动是价值的直接源泉的话，新马克思主义和新辩证法学派则强调商品，或者说经过交换，并得到交换确认后的劳动，才是价值的源泉，他们只愿意把价值与抽象劳动关联起来，而交换中能超越物与劳动的特殊性，直接获得同一性存在的恰恰是作为价值形式的货币。对他们来说，范畴概念不能脱离独特的社会关系形式而抽象地存在，价值起源于商品与商品的相遇，劳动最后需要得到货币的确认。因此，先验地确认直接生产活动中包涵了多少价值是荒唐的。在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将以一种霸权的方式，强制性地获得对人与人之间劳动关系的社會表现形式。

因此，以货币为中介和载体的社会并不是真正自由和平等的社会，而是不自由和强制性的社会。从这一点出发，他们确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正精神指向是社会批判，即马克思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主要是对社会关系本身的批判，以及对与之相关的饥饿、暴力等的批判，而并不仅仅是对资本剥削劳动者的批判。因此，通过作者对新马克思主义阅读学派的解读，我们发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中，剥削剩余价值已然不再是重点，重点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尊重过劳动，其是一处贬低劳动、羞辱一切不能与货币相交换的劳动的社会。

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科学研究和劳动生产是没有主体性的，货币，特别是作为资本的货币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体，它强迫人们以货币为准绳来进行思考并获得对世界和生命的客观态度，即以作为价值形式的货币为

标准来规训生活其中的劳动者。作者的结论是，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来说，批判性思维，而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观念才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希望，或者说真正能带给我们希望之所在。但总的说来，作者对于这一反抗及其反抗结果的设想并不完全持乐观的态度。

除了著作之外，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发表 150 周年之际，也有关于纪念《资本论》的论著的评论文章值得关注，它是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杂志》在第 156 期上的《150 年后马克思的〈资本论〉》^①一文，作者摩尔（Nick Moore）在文章开篇指出，据国际乐施会（Oxfam International）报道，全球最富有的 8 个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最穷的 36 亿人口所拥有的财富。而在 7 年前，也就是 2010 年，这个数字是 388 人。因此，和前述不同，摩尔认为《资本论》的最大贡献是劳动价值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关于剥削的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价值的生产与分配是马克思《资本论》论述的核心，马克思通过对市场关系的揭示，展示了被其所遮蔽的剥削这一现代社会不平等的起源，以及剥削的成果，剩余价值是如何被竞争性的资产阶级成员所瓜分掉的。

然而，作者指出，《资本论》第 1 卷比较难读，而且只有等到第 3 卷时，才能比较明晰地知道剩余价值是如何被瓜分掉的，和强调价值形式的新马克思主义阅读学派不同，摩尔赞赏库拉纳（Joseph Choonara）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导读》^②一书不但强调要三卷一起读，还特别强调价值概念的重要性。并且指出价值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实体（抽象劳动），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必要的表现形式即货币，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概念是未经反思的预设，对于马克思来说，货币在现代社会是一种非人的主体。作者也特别强调，在处理价值概念时一定要小心，不要把价值与交换价值混淆起来，一旦混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就将变成新李嘉图学派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误读。

作者指出，唯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剩余价值，以及其如何变成了利润、利息与租金。但是第 1 卷最大的问题在于似乎是个体工人作为劳动者的代表被个体资本家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剥削了，第 1 卷基本上未能提出总资本和总剩余价值的概念。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库拉纳特别强调了集体工人的

① Nick Moore, Marx's Capital at 150,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 156.

② Joseph Choonara, *A Reader's Guide to Marx's Capital, Bookmarks*, 2017.

概念，以及剩余价值被所有的资产阶级成员所瓜分的事实。但马克思还是遭遇到了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攻击，一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批评他无法解决转型问题，二是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人批评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在作者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总体和第3卷的视角来阅读第1卷。总之，在作者看来，理解资本主义的最好方式就是阅读马克思自己所写的《资本论》，遗憾的是，《资本论》第1卷并不容易阅读，并且是一部并未完全完成的著作。并且提醒到，虽然马克思在第1卷中已经讨论了剥削，但直到第3卷，剩余价值是如何被瓜分的才真正得到论述，因此三卷本是个相互连接的整体，任何想来真正理解资本主义运动史的人都必须阅读第2和第3卷。与此同时，他再次认为《资本论》并非只是一部有关经济体系的著作，同时还提供了方法，一种理解世界，认同工人阶级的价值。

斯塔罗斯塔 (Guido Starosta) 的《商品拜物教在马克思〈资本论〉体系辩证法中的地位与角色》^①一文，认为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是商品拜物教。在他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商品拜物教的结构体系辩证叙述，完成了对《资本论》形式规定性的根本论述。而后世真正懂得这一方法的奠基之作，一是鲁宾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二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因为只有二者开创的传统，才把商品拜物教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的基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一传统对于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来说意义深远，而不仅仅停留于认识资本主义的拜物教特征这一认识论层面上。

据斯塔罗斯塔介绍，肯恩 (O' Kane) 曾经在博士论文^②的认识论方面，用类型学方法全面梳理过拜物教的含义，最为流行的观点是拜物教是一种错误的意识，这一做法可追溯到正统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考茨基，以及当代所谓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在早期阿尔都塞的概念中，商品拜物教是不被讨论的，晚期的阿尔都塞则将拜物教视为遮蔽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体系的概念与范畴；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拜物教则被视为一种物化体系；而对于古典的人道主义传统来说，拜物教则是异化的明证，从此出发，可以反对阿尔

① Guido Starosta, The Role and Place of 'Commodity Fetishism' in Marx's Systematic-dialectical Exposition in Capit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5 (3), 2017.

② O' Kane, Chris (2013) *Fetishism and social domination in Marx, Lukács, Adorno and Lefebvre*. Doctoral thesis (PhD), University of Sussex.UK.

都塞的所谓“认识论的断裂”。对于这一点，在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的著作中可以得到明晰的论述；但是，作为价值的拜物教，则是由价值形式学派或形式分析传统而引发出来的，在这一方法中，商品拜物教被理解为非人身的客观强制体系，将人的存在化约为其人格化的存在。

史塔罗斯塔据此认为，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来说，商品拜物教更多指涉的是价值生产的客观体系，并构成了马克思系统辩证法的核心体系，即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对象性体系及其核心的组成部分，因此所谓内在批判的方法，就是要在资本主义物化关系的内部，在体系性的内部和商品拜物教的重要性的前提下，去辩证地发现批判资本形式的实践与意识。应该说，这方面的重要著作还有很多，比如格丽（Bruno Gulli）的《大地之丰：关于主权与劳动》^①的研究，穆里（Patrick Murray）的《财富的误测》^②等，他们都令人印象深刻地分析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这种方案特别强调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不是范畴本身的抽象关系，而是一种实践的抽象结果，其社会形式是价值和资本的“阴影形式”（shadow forms），不一而足。

三、政治实践与运动中的《资本论》及其价值理论

众所周知，马克思强调历史发展过程的独立性与开放性，它不能被归结于一种所有存在物都必须永远服从的思辨逻辑。应该说，不是从实证和经验，而是从交换、流动和政治实践的视角来理解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西方左翼学界的共识。比如哈维在他的著作《马克思、资本和经济理性的疯狂》^③一书中，就首先将资本定义为流动中的价值（Capital as Value in Motion），他同样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对于系统和整体性的认识，而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量、实体和静态的痴迷。因此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比较重视第1卷不同，哈维反复强调第2卷和第3卷的重要性。同样，与传统马克思主义重视价值的生产与被剥削不同，哈唯在该书中强调了反价值（Anti-Value）的重要

① Bruno Gulli, *Earthly Plenitudes: A Study on Sovereignty and Labor*,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hiladelphia, 2016.

② Patrick Murray, *The Mismeasure of Wealth: Essays on Marx and Social For*, Brill, Leiden and Boston, 2016.

③ David Harvey, *Marx, Capital and the Madness of Economic Reason*, Profile Books, 2017.

意义。换言之，今天政治斗争的场域不只是在生产领域中的价值创造与剥削和反剥削的斗争，还包括大量拒绝价值化的，反抗将一切生命实践活动都纳入到价值范畴的抵抗活动，从而激活了被长期忽视的大量抵制场域和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事实。

直面今天的政治斗争任务，将反抗实践纳入价值理论的范畴，以反价值这一概念为线索，讨论被长期忽视的多个反抗场域，包括价值实现中的抵抗、非生产性劳动的抵抗等。同时，对于英语学界反复强调的价值形式问题，哈维也有所涉猎，并且指出，对于今日强大的货币与信用系统而言，价值及其生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也给价值理论在当代的适用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样，哈维吸收了德勒兹等人的洞见，认为价值生产同时还是欲望、需求的生命生产，因此，价值生产的领域并非是抽象而标准的，其同时还是文化、欲望，甚至是等级制的。当然，哈维的核心点是强调资本主义整个生产系统坏的无限性和经济人理性的疯狂性。在资本主义生产循环运动中，其所形成的并非是一个良性的无限循环，因此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爆发危机，而这样的循环和无限是坏的。经济理性的疯狂这一矛盾性的存在，也是使得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生产面临重大的挑战与不稳定性的关键因素。

戴维斯 (Ann E. Davis) 的《作为社会制度的金钱：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①一书，很好地为读者梳理了自由主义将货币误读为简单商品交换结果的路径，作者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货币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不是商品交换的自然结果，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资本主义的全新视角与框架。通过权力将之作为社会制度之后，货币才真正取代传统的社会关系模型，使得现代基于货币的“分工”变得十分自然。货币这种抽象的致富欲才真正稳定而又安全地发展起来，从而人们对金钱的渴求才变得更加迫切。应该说，从国家、权力和制度的视角来追述货币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货币只有成为一项有权力作依托的社会制度之后，其才真正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贝斯特 (Beverly Best) 在《透过棱镜看政治经济》^②一文中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正日益转向拉弗蒂等人所称的“投机” (speculative) 和“循环” (cir-

① Ann E. Davis, *Money as a Social Institution: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Routledge, 2017.

② Beverly Best, *Political Economy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Imagining Six Impossible Things about Finance before Breakfa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5 (3), 2017.

culatory)螺旋之中不能自拔。其代表着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积累的现代性深刻的断裂,也意味着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批判显得有些多余。但在作者看来,虽然金融资本主义改变了表象和剩余价值的实现形式,但是基于生产、流通的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本质形式并未发生改变。马克思关于阶级、剥削和价值形式的讨论与当代社会仍然有巨大的相关性,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统治模式是必要的进路。

作者进一步指出,过去的几十年,关于金融、信用体系在资本积累和财富分配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受到有关学者的重视,然而,作者认为信用体系并非当今的资本主义所独有,金融统治地位相对于生产和流通过程的日益增强,甚至金融系统与生产和流通过程的日益分离,被定义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日益金融化和虚拟化。并用投机资本主义来指称这种非生产导向的形态,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生产理论在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多余或过时,或者说价值生产已经不是整个社会的主导性环节,因此,剥削的形式和阶级的对抗等一系列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范畴概念就需要被更新或重新诠释,以便于真正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范畴概念需要反映新的现实这一要求。作者承认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但认为这种变化是现象和拜物教层面的变化,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质性的变化。因此,马克思的阶级、剥削和价值形式范畴仍然管用。

罗伯茨(John Michael Roberts)在《公共领域中的马克思商品理论概论》^①中指出,最近几年来,公共领域这一概念代表了市民社会的人们可以通过对一系列有关他们权益的事项进行辩论和讨论的领域,并且逐步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然而,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未能在政治经济理论的架构中将其正确地置于普遍的商品交换关系之下讨论。作者认为,公共领域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政治现象,即不同个体和组织就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争论和发表异见的领域。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公共领域是同质和规范性的实体,即个体可以远离他们的偏见,让渡他们的私利,以达成共识。从教育和调节性的视角来看,公共领域是可以被培育和陶冶出来的,或者说公共领域是可以透过大众传媒形塑出来的。再次,对于很多激进分子来说,公共领域是诸众的声音得

① John Michael Roberts, Outline of a Marxist Commodity Theory of the Public Spher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5 (1), 2017.

以被聆听的一个绝佳机会。

然而，在罗伯茨看来，就如迪恩（JodiDean）所认为的那样，传播资本主义与网络时代的自由民主政治存在巨大的局限性，网络媒介构造的世界往往和真实的现实生活本身有着巨大的差异与距离，并形成了自身永无止境的循环，因此所谓的公共领域往往构建出来的并不是自由主义者所说的“规范实体”，而是“幻象”。其是如拜物教般虚假的现实，其显示的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对之无能为力的现实，并且其也帮助人们理解现代社会的所谓活动。因此，公共领域的拜物教是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其可以从商品形式中发现他的端倪，而不是自由主义所描述的那样，公共领域中呈现出来的是自律和自由，其使得个体能够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对话与讨论之中，获得真实的存在。

因此，以弗雷泽等为代表的后激进马克思主义针对性地提出了反公众的概念（counterpublics），批评哈贝马斯等人对资产阶级理性讨论的过分理想化，从而对公共领域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前提过于忽视。总而言之，在罗伯茨看来，公共领域是普遍商品关系的某个侧面的拜物教领域，它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相互中介的结果，或者说，在他们开展公共领域的活动之前，他们已然是商品的买者和卖者的关系了，即相互之间已然是相互独立的，只为了自己利益而存在的原子个体关系了，他们是带着商品交换逻辑彼此进入到对话和交流环节的。

因此，和将公共领域视为可超越权力关系，可置于社会分工之前的做法不同，罗伯茨在该文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的概念，或者商品化的公共领域的说法。这个公共领域是不可协调和还原的力量及利益相互中介的结果，这个过程的结果不是同质和规范性的实体，而是原子个体的差异与纷争，同一性的建构恰恰意味着差异的确立，这样的政治就意味着持续的对抗与冲突。结果是多元主义和冲突性的霸权共识（conflictual consensus），而不是协商共识（deliberative consensus）。换言之，协商民主和公共领域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人们相互之间不把对方理解为敌人或竞争者，不同个体的理性对话才可能，因此，自由主义和哈贝马斯的最大问题，在于忽视了公共领域的结构性条件。总而言之，公共领域并不是超越结构的形而上的政治空间，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结构的拜物教结果。

四、认知、审美与抵抗策略

祖库福德 (Mariano Zukerfeld)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知识: 认知资本主义导论》^① 一书中指出, 马克思常被批评为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知识的作用, 这不但表现在他的剥削理论中, 同样也表现在他的劳动价值论中, 自治和后结构主义者又常常被批评为创造了美丽但空洞的概念, 以至于无批判地倒向了资本主义经济。但作者认为这些都是和各种对马克思的误读密切相关的。在书中, 作者通过对物质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交叉性分析, 提出了认知唯物主义 (Cognitive Materialism) 的概念。

甘德煞等人主编的《审美的马克思》^② 一书中, 诸多作者一致认为, 审美问题是马克思终生关心的重要问题。甘德煞在文中指出, 不只是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关心审美问题, 所谓的反人道主义的《资本论》中, 马克思同样非常关注审美问题, 早期的马克思主要从规范性的非异化劳动的视角阐述了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美好状态, 共产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就不只是对治理制度的调整与修正, 其更意味着主体性构建条件的根本转换。而《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关于审美问题的讨论确实已经从纯粹的沉思和异化的存在转向了实践, 从而真正激活了解放的主体性。

甘德煞更进一步指出, 如果从社会变迁的视角来理解审美, 我们就能发现马克思那里的第二种审美逻辑: 它不再强调主体性, 而是从更为广阔的革命的社会过程和对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入手。辩证法的问题也进入了这种审美逻辑之中, 我们因此也就能理解《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生产力大发展的赞美了。因此也不难理解, 当马克思讨论资本主义从形式从属向实质从属的转换时, 也更多持一种赞美和欢迎的态度。在作者看来, 加速主义 (Accelerationism) 对马克思来说是审美的, 因为其为新的历史样态提供了可能性与基础。

此外, 甘德煞还认为马克思还存在第三重审美逻辑, 即《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审美, 其不但渗透于资产阶级革命之中, 而且

^① Mariano Zukerfeld, *Knowledge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Materialism*,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London, 2017.

^② Samir Gandesha & Johan Hartle (ed), *Aesthetic Marx*, Bloomsbury, London, 2017.

渗透于对未来的诞生之中。它已然超越了既定的历史逻辑，而且创造了新的历史逻辑，这里所体现的实践是一种革命的实践。

在施密特等人所编撰的《今日阅读〈资本论〉》^①一书中认为，尽管《资本论》写作的历史背景已大大不同于今日，但其仍然能够诠释今日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与趋势。虽然该书的作者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但他们共同的信念是，要讨论社会主义的革命与政治实践，就必须阅读和研究《资本论》，因此，他们并不将《资本论》视为一本经济学著作，而是视为帮助社会主义理解政治斗争的场域，区分同盟与敌人，战略性地回应当代的社会政治格局。即《资本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是如何生成的，以及社会主义战略是如何可能的。对齐泽克来说，他认为马克思较少地参与现实的政治实践的根本原因，是他花足够多的时间到大英博物馆中撰写《资本论》，但马克思是政治斗争的理论思考者与研究者。

而在汤普森和史密斯关于认知资本主义的讨论中，先介绍了奈格里等人关于认知资本主义的诠释，即主张认知资本主义时代价值的萃取已不再依靠劳动时间，而是依靠信息与知识资本。他们因此主张今日工人阶级的劳动变成非物质劳动，即一种“头脑的、情感的、交往或关系的，或与商品的信息与文化内容有关系”的劳动，他们也据此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概念对于当代的资本主义而言不再相关，或者至少需要做新的诠释。但汤普森等人不同意认知资本主义的说法，指出这些理论家并不真正明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未能提供资本在当下是如何规训劳动者的新的分析，同样也不能真正理解价值形式的主宰性，因此奈格里并不能真正理解当代阶级斗争的本质，以及马克思《资本论》中从价值形式出发才能加以理解的关于剩余价值的深刻内涵。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该书名为《今日阅读〈资本论〉》，但其并不是关于《资本论》的教科书式导读，而是研究性论著。

与从价值、剩余价值入手思考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不同，提·巴塔查里亚（Tithi Bhattacharya）主编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重绘阶级，重思压迫》^②认为社会再生产领域，才是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和剥削的非常重要的领域，只有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活动（production）与社会再生产（social re-

^① Ingo Schmidt and Carlo Fanelli (eds), *Reading Capital Today*, Pluto, London, 2017. p.224.

^② Tithi Bhattacharya (ed),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Remapping Class, Recentering Oppression*, Pluto Press, London, 2017.

production) 活动联系起来进行总体考虑, 才能真正明白资本的利润来源和受压迫、受剥削的群体是谁, 即今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不但要洞察到生产商品的劳动和劳动者, 更需要揭示那些被古典经济学家用解析的方法隐藏、并被政策制定者所否认的劳动, 特别是家庭中的妇女家务劳动。

提·巴塔查里亚希望通过社会再生产的研究, 让原本被忽视了了的性别歧视、种族压迫等非生产劳动的剥削和压迫, 能和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的剥削一道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重视。提·巴塔查里亚通过研究后指认, 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暗示性地指出了社会再生产与生产活动本身的联系与差异, 但遗憾的是, 马克思本人未能予以详细阐发。戴维·麦克纳利 (David McNally) 同样在书中指出, 我们应当使用交汇性理论 (intersectionality theory) 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剥削理论与种族化和性别化的关系进行交融式互动研究, 而不是与在资本主义劳动及与之相关的再生产领域的劳动进行对抗和排斥。此外, 文集中还收录了来自如南希·弗雷泽 (Nancy Fraser)、萨拉·穆罕德斯 (Salar Mohandesi)、艾玛·迪特尔曼 (Emma Teitelman)、苏珊·弗格森 (Susan Ferguson)、卡门·泰普·霍普金斯 (Carmeen Temple Hopkins)、萨拉弗·萨丽塔·奥兰 (Serap Saritas Oran) 以及阿伦·西尔斯 (Alan Sears) 等重要作家的文章。

五、国家、霸权与激进政治的面向与未来

博内费尔德 (Werner Bonefeld) 在《强国家与自由经济》^① 一书中指出, 人们常常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定义为政府权力弱化的全球资本主义金融化趋势, 从而将新自由主义理解为古典放任自由 (laissez-faire) 主义的再度复兴, 似乎竞争性的市场只能通过政府的弱化来得以加强。但与之不同, 博内费尔德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奠基于强政府之中的政治事业。问题的关键还在于, 作者否定了将国家和经济二元划分的传统做法, 即所谓经济的独立性和国家的干预, 因此, 今日之政治既是经济的, 更是在国家层面展开的。博内费尔德为读者呈现了主权的逻辑, 以及自由主义及其发展的真实逻辑, 即其所需要的政治形式, 还有目前的资本主义秩序所意味着的危机与灾难。

^① Werner Bonefeld, *The Strong State and the Free Economy*,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London and New York, 2017.

博内费尔德在书中明确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真正范型是奥尔多式的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或者说秩序自由主义主张国家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制定市场的政策以确保竞争性的经济制度以反对民主化的过程。博内费尔德通过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自发性和放任自流的教义，特别是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无法解决大众的无产阶级化和整个社会的危机问题，因此竞争性的市场要求强势的政府和政治秩序。与自由经济相应的恰恰是政治秩序。因此，他非常强调国家权力对于确保经济自由的关键性作用，而这样的国家是非议会民主制，而是一种决定论式的威权国家，对新自由主义者来说，大众民主对于自由经济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国家的独立性使得根据被治理者的利益而展开的治理成了悖论。

与此同时，和议会自由主义不同，奥尔多自由主义为施密特的“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辩护，对他们来说，民主国家导致一种纯粹数量的国家，以至于国家不能真正区分谁是自由的敌人，谁是自由的朋友。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是独立于市场和社会，并保护着自由经济免受大众无产阶级冲击的存在。它不但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同样反对民主的自我管理的原则。因此反对民主的大多数主义，即自由必须得到国家的保护，从而才能获得持续的竞争秩序。和强调客观的、规律一样的、自然的经济竞争属性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不同，奥尔多自由主义坚持自由经济是政治建构的结果，而不是个体互动建构的结果。完全竞争是一个经济范畴，更是个社会范畴。自由主义经济过度强调了责任、个体性、自决的道德价值。就具体的情况而言，博内费尔德认为所谓撒切尔主义就是“自由市场加强势政府”。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76年的时候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过著名的《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二律背反》一文，在2017年时被整理成书重新发表，作为其姊妹篇，安德森在2017年新写了一本《这个H词：霸权的诸次突变》^①一书予以发表。在安德森看来，以H开头的词有很多，比如H弹（hydrogen bomb，氢弹），但该书讲的主要是hegemony的H，即通常所说的领导权与霸权。就如先前的诸多著作所阐明的那样，安德森在该书中梳理了hegemony的各种语义及流变。特别是在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文明中的变化、及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以及葛兰西如何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继承和重

① Perry Anderson, *The H-Word: The Peripeteia of Hegemony*, Verso, New York, 2017.

新闻发了这一重要的概念。

但对于安德森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德国保守主义法学家海因里希·特里佩尔（Heinrich Triepel）关于霸权的重要思考。安德森希望多多重视中国传统中王霸不分的传统。即强制（coercion）与合意（consent）的一体化。这一概念史的考察是丰富多彩的历史论著的一般呈现，一定会让读者收获良多。不过，最为重要的倒不是概念史的梳理，而是对当代现实的判断。对于当前流行的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争，安德森认为可能会出现一个没有单一霸权国的霸权体系（hegemonic system）：在这个体系里，多边关系呈现出一种交融式的自我平衡稳态，因此不再需要一个维持霸权秩序的最高统治者。这一想法倒不是安德森首先提出的，在乔万尼·阿瑞吉《漫长的二十世纪》一书中就已经设想了这样的可能性。但安德森对于多边主义的持续稳定性持保留态度。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全球思想界的影响力日盛，在英国同样如此，他的《身体的使用》^①一书在英国学界同样大受欢迎，该书主要思考的问题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在遭到卢卡奇拒斥，以及苏联政权倒台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会是怎样的？特别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被福柯的生命政治的批判所增补，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被替换成了施密特对政治神学的批判之后，国际工人阶级的运动被替换成了激进的无政府主体等之后，我们如何还能思考抵抗与批判。

应该说，该书最大的特征，是阿甘本在《神圣人》系列经典的后马克思主义转向之后的再思考。《身体的使用》一开始分析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主权与奴隶的辩证法，进一步分析马克思所讨论的工资奴隶及其生物技术逻辑的变种。进而批判了西方的形而上学自始以来就制造了灵魂与身体、本质与存在、公共与私人的分离。在该书中，阿甘本进一步分析了奈格里曾经谈及的宪制权和制宪权，进而讨论了在当代技术资本主义国家中身体的主权使用，同时筹划了对主权利力的无政府主义抵抗。可以看出，其对现代政治的理解是非自由主义的，而是施密特关于绝对主义国家的解释范畴。

同样一贯批判后马克思主义的迪恩（Jodi Dean）在《群众与政党》^②中认为，

① Giorgio Agamben, *The Use of Bodies*,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 2016.

② Jodi Dean, *Crowds and Party*, Verso, London & New York, 2016.

虽然承认奈格里等人对主权政治分析的深入性，但却对 2008 年以来的各种抵抗、占领和骚乱、示威持批评的立场。在他看来，虽然这些运动已经突破了个体和自由主义的左翼政治藩篱，显示了强大的集体性的力量，但这些运动并不会带来真正的社会转型，因为社会转型的唯一前提是共产主义政党的带领。“没有党，就不会有记忆、学习和应对”资本主义的犯罪，也并不会真实明白人民的需要。唯有政党能够通过群众完成与资本主义的断裂，从而真正形成集体中的政治主体。

换言之，唯有政党才能完成移情关系的转移并正确地看待自己，而这恰恰是今日左翼政治最为根本的问题，对他来说，任何不愿意讨论政党的人都没有资格讨论政治转型。群众虽然有力量来完成与日常政治的断裂，但对于转型来说，群众的断裂必须变成跟随主体的政治化运动，而主体就是共产党，从政党的视角来反观自身，群众才能认清自身的政治理想与利益，或者说政党是唯一能够让人们形成集体而非自由主义个体眼光的组织。政党能够使得群众的政治意识敏锐起来，变成他们原先所不是的状态，对于反资本主义而言，唯有政党能够带领我们离开资本主义，进入到共产主义的新世界。因此，迪恩对于微观政治、身份政治和无政府主义等是非常不屑一顾的。原因在于后者所强调的不过是奇异性的、新奇性的，或者当下性的意识。

哈特与奈格里合作撰写著作似乎已经成了固定的模式，但他们关于组织的思考，仍然是强调灵活性临时性。英国剑桥出版社 2017 年出版的《集会》^①一书，就试图回应最近几年因齐泽克和遇恩的鼓吹而日益复兴的所谓“政党拜物教”。哈特和奈格里试图要超越主权与固定架构的政治，致力于诸众的共同性及其反权力的机制，他们对现代社会的主权构架，即官僚理性、私有财产和政治主权是排斥的，甚至主张要将其完全撕碎。对他们来说，真正激进的左翼和具有稳定框架的国家治理不可能同时存在，左翼需要的是一个“新王子”，而不是已然陈旧腐烂的“王子”，因此，不是一个领导人或者一场运动，而是具有共同性的奇异性集体。

该书主要从运动的策略、非主权机构的发明、差异化的夺权、取回固定资本、诸众的事业等方面来展开。他们试图在社会生活的内部来奠定政治规划的事业、探索多元的合作本体论、非财产的共同性、对国家的摧毁、生产权力

①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Assembl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7.

的主体等等。因此，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民间政治，其结果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权力结构，其能获得的，最多只会是技术性的社会霸权，其所生产的运动，更多的是民粹主义的运动，因此不可能真正攫取国家和市民社会的霸权。

换言之，这是一种战术性而非战略性的政治，领导权是特定议题的反射性回应，一旦特定的局势发生了变化，领导权和领导者就必须取消，对他们来说，政党必将异化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并重复卢梭关于公意这一有缺陷的遗产。总之，《集会》一书提供了反抗全球资本的各种潜在路径及其斗争的新模型，重思了领导权的问题，并强调一种新的情感本体论和主体性的社会必然性，社会罢工成了抵抗资本的最为主要的途径。

在麦克洛克林 (Daniel McLoughlin) 等编撰的《阿甘本与激进政治》^① 一书中，阿甘本的激进哲学毫无疑问早已在英语世界得到重视，不过，从经济与国家治理的视角入手的研究著作倒是少见，而由麦克洛克林等人编撰的《阿甘本与激进政治》一书，更为重视阿甘本的《王国与荣耀》及《最高的贫困》，并将其激进政治哲学的思考放置到当下的政治斗争之中。不过，作为系列著作的另一本，《身体的使用》倒是出版于该书的诸多文章之后，这也意味着该书所掌握的材料并不完整。比如阿甘本的“生命的形式”这一概念，就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

但是该书仍然是任何一位想要深入了解阿甘本的《王国与荣耀》、《最高的贫困》这两本书的必要读物。不过该书对阿甘本的总的判断是，阿甘本并未真的完全超出本雅明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宗教的批判框架，即现代货币是自我指涉和纯信用的。因此资本主义是纯粹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该书的其他文章还讨论了阿甘本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关系、福柯对阿甘本的影响等。但他们认为阿甘本拒绝通过革命重建任何政治秩序的主张，使得阿甘本的任何政治都是非政治的，因为治理、经济、法律或权利本身都是政治秩序的内在机制，或者说，阿甘本的政治是超越政治的美学。

马克思的《资本论》常常被理解为一本经济学著作，但在其150周年的纪念著作中，却有越来越多的论著认为其更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罗伯茨

^① Daniel McLoughlin (ed), *Agamben and Radical Politic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Edinburgh, 2017.

(William Clare Roberts) 的《马克思的地狱：〈资本论〉的政治理论》更是直接指出这一点，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必须被恢复为一本政治理论著作，这不仅仅是因为其写作的特定政治背景，更在于他对现代世界的持续挑战以及追寻真正自由的努力。”^① 但该书在运用但丁的范式来研究《资本论》时，却只重点关注了第1卷，对于第2、3卷则缺乏深入的研究，作者的理由是只有第1卷是马克思自己准备和修订出版的。另一个引起学界争论的点，就是其试图颠覆更具黑格尔传统的阅读路径，在他看来，“体系辩证法”诠释路径的根本局限性在于未能将历史分析整合于内。罗伯特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无人身的统治体系，但对于这一点，不管是海因里希还是波斯顿均早已指出。不过，他指出海因里希的逻辑是商品形式的逻辑，而波斯顿则着重强调抽象的社会结构。相反，他认为自己的优点在于，仍然将这套无人身的体系理解为人对人的统治与剥削的体系，但这个剥削和统治是通过中介的、非直接的和非人身的方式完成的。

六、结论

虽然2017年英国马克思主义热闹非凡，但总的来说，还是在希望中透露出了对现实苦难和无力取代资本主义的无可奈何，只是诸多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这一点，而齐泽克这个学术界的摇滚巨星则往往口无遮拦、笔无禁区，他的《无望的勇气：危险行动的年谱》^② 引起了诸多的非议，但也道出了实情：我们要正视当代资本主义在现实可预期的将来还不会崩溃和被社会主义所替代，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的这一当前的境况是彻底绝望的，然而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痼疾，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是深入的，是能起到改变和激励作用的，从这点来说，事情本身已经起了真正的改变。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① William Clare Roberts, *Marx's Inferno: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Capita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17. p.1.

② Slavoj Žižek, *The Courage of Hopelessness: Chronicles of a Year of Acting Dangerously*, Allen Lane, 2017.